

文学写作的理想之维

□丁国旗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个已经被人们广为理解和认可的创作理念，在我国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考察当前的文艺创作，我们发现许多文学作品只是做到了前一半，即“源于生活”，而无法做到后一半，即“高于生活”。虽然很多作品对于“纯自然”的生活写得十分细腻，但在“高于生活”方面却毫无建树。作品没有追求，缺乏理想。

以笔者个人的粗浅理解，艺术与生活是不能等同的，是艺术就不是生活，而生活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以成为艺术。按照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学活动要由作品、作家、读者、世界四要素构成。虽然读者（包括批评者）、世界（社会生活）等对作品的形成与完善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作家才是整个艺术创造活动中最为重要的角色，作家是生活成为艺术、艺术“高于生活”的原因和灵府所在。作为一种艺术存在，文学需要表现作家的审美追求、情感与评价、人生观、世界观等，它们构成作品的主旨，并将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或评论家所关注，从而成为作品经典化的根本因素。马克思称赞希腊艺术和史诗发生在人类完美的童年时代，具有“不朽的魅力”，不仅能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里所肯定的正是希腊神话中所蕴藏的高于“神话”的东西，即神话“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希腊人幻想的基础”（引文同上）。

笛卡尔说，“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好书之所以好，就在于作品中所传达的超越于现实经验的思想和精神，在于作品的“形而上质”（英伽登语）。对于读者而言，读书是需要付出时间、精力与财富的，相信没有哪一个正常的人会在付出了许多之后，希望从书中得到只是自己早已熟悉的、可以看到听到的东西，而没有思想或情感上的提升。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在他的《审美之维》中曾言，“无论艺术是怎样地被现行的趣味和行为的价值、标准以及经验的限制所决定、定型和导向，它都总是超越着对现实存在的美化、崇高化，超越着为现实排遣和辩解。即使是最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建构出它本身的现实：它的男人和女人、它的对象、它的风景和音乐，皆揭示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尚未述说、尚未看见、尚未听到的东西。”他认为，艺术的王国提供“更‘高贵’、更‘深沉’，也许还更‘真实’、更‘美好’的东西”，因此艺术可以引

领生活，将人们从现实生活的压抑中解救出来。的确，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文学作品应该给读者更多的东西：情感的提升或精神的补偿，对现实人生的激励与启发。

二

古今中外在对文艺作品的评判标准中，也总是少不了“理想”这一维度。或者可以这样说，作家或评论家对于理想的抒写或肯定本身，就能够构成好的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

我国古代文论中所形成的“诗言志”“诗缘情”的写作传统，在“情”“志”之间，体现着古代作家为文的基本理想；孔子所倡导的“尽善尽美”“文质彬彬”则构成了这位儒学导师自己对于文艺最高标准的原则与看法；曹丕所提出的“文经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白居易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韩愈和柳宗元等大力倡导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以及袁枚钟情的“性灵”、王国维心仪的“境界”等，都无不在其对“理想”的直接追求与理想作品的评价中，展示出中国历代文人对于文学作品中“理想”书写的探索与追求。

在西方浩繁卷帙的文艺理论典籍与文艺实践中，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标准等，也都对文艺作品的理想维度重视有加。拿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标准来说，本身就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把“理想”作为作品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提了出来。他在遗嘱中所确立的文学奖的审核标准是：授予“最近一年来”“在文学领域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虽然，为了便于评奖，1900年经瑞典国王批准的基本章程中将“最近一年来”改为“近年来创作的”或“近年来才显示出其意义的”作品，“文学作品”的概念也扩展为“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即包括历史和哲学著作，但作品中必然要表现的“理想倾向”却没有任何改变。也正是由于始终坚持“理想倾向”，诺贝尔文学奖才一直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它神奇的信誉与吸引力，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此都心存敬重。194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获奖演说中说：“我感到这份奖赏不是授予我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工作——授予我一生从事关于人类精神的呕心沥血的工作。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为名，更不是为利，而是为了从人的精神原料中创造出一些从前不曾有过的东西。”他还说，“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我想，福克纳已经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文学作品不在于别的什么，而在乎“那些古老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这些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指向一种更高价值的思考与感悟。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作家关于文艺问题的许多重要论述中，也有许多涉及到文学作品的“理想”问题。如恩格斯在1859年5月18日写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曾经提出的“三融合”的戏剧理想，即“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这里除去对艺术创作技巧上的要求外，“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就传达出了恩格斯关于戏剧作品评价的理想标准。“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都是只有在作者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与把握中，在作家个人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指引下，才可能真正达到的高度。

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文化的兴起以及后现代思潮对社会的全方位侵袭等，造成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文学“理想”书写的多重颠覆。过去被人们所看重的许多主导性价值被边缘化、娱乐化或戏谑化，“理想”或者变为文学作品中的多余物或者成为作品难以问津的奢侈品。

随着文艺被逐渐推向市场和作品的不断商品化，作家这个曾经为人尊崇的身份，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诱惑下，许多作家开始迎合市场，有些甚至直接拥抱金钱，为版税而创作，不再关注艺术作品中的理想价值与审美追求。这种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思想决定，由金钱决定而不是由艺术决定的创作倾向，

使许多作家丧失了对艺术创作准则与底线的坚守与维护。马克思曾言，“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7页）然而，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大部分作家而言，这种要求显然是难以兑现的。

再者，虽然我们从不怀疑读者的阅读素质正在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提高，但大众的审美趣味与理想追求毕竟是杂乱的，是需要引导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当任何思想或生活方式都可以被十分容易地得到宽容与理解的时候，生存的多元带来了思想的多元、需要的多元，所有这些都使刚刚被推向市场的文艺作品不能不倍受牵累，读者的好恶因而也就成为作家们从事创作的重要标尺。文学作品当然必须接受读者的阅读和评判，但如果仅仅以销量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作家的创作业绩或成就，也就难免会使一些过于考虑或追求理想的作家心态上有所失衡。这样，不是作家来引领读者，而是读者在引导作家，如此的创作模式，如果还能创作出有极高价值的作品，怕也只能是空谈家们的一相情愿。源于西方的“读者接受理论”虽然让我们改变了过去轻视阅读者的偏见，但重视一方决不能成为轻视另一方的理由，对市场与读者的依赖，成为造成文学理想缺失的又一重要原因。

当然，文学理想书写的缺失还与文学自身的发展相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于文学的重大冲击就在于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生态关系。作家与读者、创作与阅读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文本的呈现与阅读的方式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所有这些都使文学守护理想变得十分困难。今天，网络文学写作已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这既可以从众多论坛/BBS中文学类论坛占有的高比例、文学类网站中原创文学发表数量的巨大数目中表现出来，同时也从发展势头迅猛的“博客”写作、文学创作的个人主页中体现出来，庞大的上网队伍以及网民的年轻化也进一步壮大了网络文学写作的强

大阵容。然而，网络文学、博客写作已经将文学推向了“泛文学化”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文字公布于众，通过互联网广泛地散播。文学历来所推崇的崇高、深沉、美德、正义、人情等价值已经被逼到了最不起眼的地方，取而代之的大多是低劣的文字在诉说着低级趣味的故事。

四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我们很难拒绝与遏制那些轻理想、重感官娱乐的作品出现，但文艺创作从来都是一件强调精神创造的事业，是触及灵魂的工作。斯大林称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退一步讲，即使作为一种职业要求，作家在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放弃理想追求。因此，改变当下文学“理想”缺失的现象，笔者认为，除了净化写作环境外，作家自身素质与境界的提升将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马克思说，“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7页）越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越是需要知识分子以冷静的态度审视社会变化与文化转型所带来的问题，以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凭借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热情，尽到知识分子的一份责任。作家要成为时代的思想者。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赢得了世界的赞誉，但伴随着物质文化的不断提高，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的滞后越来越明显；同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诸如生态环境等具有世界性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看到，对每一个从事精神生产的人来说，他个人的创作已经不单单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成为全人类事业的一部分。“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语），走出当下娱乐化、感官化的文学创作藩篱，关注文学与人类未来的终极价值，将是中国作家迎接这一事件的前提条件。

“他们不是在写爱情而是在写情欲，在他们描写的失败中没有任何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在他们描写的胜利中找不到希望，更糟糕的是找不到怜悯和同情。他们的悲剧没有建立在普遍的基础上，不能留下任何伤痕；他们不是在写心灵，而是在写器官。”但愿福克纳在受奖演说中的这句话，能够成为当下作家从事创作活动时首先提醒自己的东西。

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12)

媒体批评与艺术家

□田川流

感且引人注目。

媒体批评具有突出的特点：论题的敏感，亦即批评的论题往往对当下事态反应敏锐、与大众的关注息息相关；传播的迅捷，由于借助现代媒体的巨大功能，形成批评信息的迅速延展；形式多样，媒体批评的样式从传统的论文式批评拓展到对话式批评、专栏式批评、跟踪与调研式批评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影响的广泛，媒体批评已由传统的单纯文人之间的批评活动扩展到大众化批评，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力；反馈的及时，媒体批评具有十分便捷的反馈方式与通道，甚至可以形成与批评或反批评的直接对话。正是这诸多功能，体现出媒体批评的极大优势，同时也形成了艺术家对于媒体批评的关注与倚重。

媒体批评与艺术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具有共同的使命、共同的利益。首先，面对着共同的社会使命，亦即社会赋予媒体和艺术家共同的社会文化发展的重任，二者均要在社会文化发展中展现自身，不仅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且为社会文化产业及经济发展的增长作出贡献。包括提升经济文化的品位、经济文化的科技含量、经济文化的社会化因素等；其次，无论是媒体或艺术家、艺术实体，自身也需要在社会大潮中获得发展，既要造就文化建设的重要实体或个人，也要努力在经济利益与市场的层面获得良好的效益，以增进自身的实力。

媒体与艺术家在其发展中还是共生的关系，互为动力结构。由于艺术信息及其成果需要得到传播，因而艺术家离不开传媒；但由于传媒需要扩大其影响力，需要通过对于艺术家及其成果的传播，而获得更大的效应。其间，二者既是相互借重的关系，也是相互依赖、水乳交融的关系，同时互为发展的动力，形成相互促动的态势。

媒体批评对于艺术家的促动，通常表现为通过对于艺术家或艺术作品的推介与评论，形成人们对于艺术家及其作品价值、特色、水准等方面的一致，艺术家一方面获得一定的社会声誉，同时也得到继续提升艺术水准的启示和动力。媒体对于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与创制的评价，关涉到对于大众艺术欣赏和审美文化普及的引导，以致影响到文化艺术活动的价值与方向。正是由于媒体的努力，使得一些艺术家或艺术实体的活动得到迅速传播与拓展，可能会在一夜间成为世人皆知的明星。由于通常居于主体的一方，媒体对于艺术家，因而有着褒贬与高下的把握，宣传规模与时间的控制等权力。无论是褒扬，或是指斥，还是客观介绍，均体现着媒体对于社会文化艺术的调控与促动。

艺术家对于媒体也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当艺术

活动、艺术家及其作品影响力迅速增强，媒体也会表现出强烈的渴求。一方面，可以通过大量传播艺术信息，评价艺术产品，迅速扩大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同时，可以获得更大的收视率、发行量，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具有文化产业的重大效益。

作为批评，媒体与艺术家有时意见一致，有时意见相左，都是正常的。如果处处一致，恰恰失去了批评的意义。在一般情况下，媒体所持有的批评标准，均与社会具有共识的评价艺术的尺度相一致。但是，有时某些方面的批评也会与少数人的利益相关联，滑向某些人们的利益需要。其中主要是商业利益的驱使、人情利益的纠缠以及权贵利益的制约。由于这些方面的利益的驱动，形成了无形的大网，既困扰媒体，也困扰了艺术家。

媒体对于艺术家、艺术现象的批评活动，在本原意义上是中性的，既有褒扬，也有指斥。如果出于利益的需要，对于艺术家和艺术产品做出不符合实际的吹捧或打压，将对艺术活动及其艺术家带来负面的影响，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在新世纪文化建设大潮中，媒体批评与艺术家应通过科学的批评活动形成良性竞争与求同存异的关系，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获得共同发展。和而不同，即在方向与愿景相一致的情况下，追求和谐的共同发展的局面，建设双赢的平台。而这种“和”的局面，不是消除一切差异的和，只有在承认差异，承认矛盾的基础上，追求和谐共处的氛围，方能获得共同发展的机遇。

无论是媒体还是艺术家，均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担当起社会的责任。文化自觉，就要恪守作为传媒人与艺术家的文化职责与历史使命，在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评判的标准、文化价值的判定、文化的社会效应、文化的大众接受等方面，予以清醒的认知与科学的把握。媒体与艺术家均应以社会文化发展和人民利益为重，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与艺术发展的规律，形成对于社会的文化建设的合力。

一方面，应在共同的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方向与愿望一致的基础上，提倡媒体批评的多样化。媒体对于社会文化的担当使得媒体人应当审慎地恪守自身的职责和权利，在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各门类艺术、各民族艺术之间，高扬积极的健康的艺术活动及其创造，排斥与抨击消极的与低俗的艺术活动及其作品。其间，既应充分表现出艺术活动的多姿多彩及其审美观念的差异，又应准确把握批评的客观标准与尺度。同时，媒体还应尊重艺术家，包括充分尊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人格尊严及其审美意趣，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批评，无论是褒扬还是指斥，均应以促进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服务于社会文化建设与保障人民大众文化利益为旨归。积极的艺术批评有利于媒体与艺术家形象的确立，以及自身社会信誉度的增强和影响力的扩大。

另一方面，媒体代表着国家、政府与公众的意志，有着社会公正与道义的光环，因而对于社会文化建设与艺术起到重要的制约与规范作用。特别是在我国，媒体大多具有国家所有的性质，因而就更加拥有权威性，甚至具有排他性。当面对一种文化现象到来的时候，媒体因其所具有的巨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所做出的评判及其影响就会大大超过社会其他方面所发出的声音，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媒体批评又代表着正义、科学与进步的精神。作为媒体人，应当在法制的基础上，在社会道德和公义旗帜的指引下，宣传与推介优秀的艺术家与产品、阐释与揭示艺术活动的当代规律与特性，批评与劝诫艺术界时常出现的不和谐的低俗的倾向，引导艺术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艺术的轨道上健康发展。而作为艺术家，也应在接受社会规范、媒体促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艺术创造的自由和智慧，创造无愧于时代的艺术作品。

李白精神史的形象勾勒

□古远清

当代的历史小说家繁星满天，中原大地尤其是河南南阳地区的繁星最为耀眼：前有《李自成》作者姚雪垠，后有《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现在又走来一位手捧《太白醉剑》（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登上文坛的程韬光。

《太白醉剑》是程韬光“大唐诗人三部曲”的第一部，作者用一种充满诗性的、狂放恣肆的叙事话语，逐步打开了“诗仙”李白的心灵大门及其成长足迹，期间又穿插了大量的李白诗词，这就使读者如同阅读一部李白的诗史，一部唐代浪漫主义诗派的诗史。还应指出的是，这部小说是用现代人的观念写李白，其文笔带有狂欢化的倾向，每当我写到李白敢制胜时，显得非常感性，毫不掩饰自己的倾向；它或使用西方舶来的解构手法，对传统观念和秩序进行大胆的颠覆；它写主人公“将复古道，舍我其谁”，其狂妄其对神圣的亵渎超过一切古人。由于书中贯穿着唐朝的历史和诗史，故要读懂这部大书首先要有关史之乱一类的古代史常识，尤其是对大唐盛世的朝章制度、皇宫景观、官中礼仪、登基庆典、军机执政、开科取士、社会风俗等有大致的了解，才能进入作者所缔造的艺术世界。

《太白醉剑》成功之处来源于浓郁的民族风格。作品中所写的人物，多得难以统计。从唐玄宗到安禄山，从

作为鲁迅思想与精神重要传人之一的聂绀弩，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性。刘保昌著的《聂绀弩传》（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2008年1月出版）以严谨的创作态度，开阔的文化视野，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位个性极为鲜明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聂绀弩集率真狂狷、特立独行于一身，时而“金刚怒目”，时而“菩萨低眉”，时而“激昂潇洒，奇崛高古”，其诗词文章，情采飞扬，令人称奇。然而若以幸福快乐为标准来衡量人生成败，他却是特殊年代里一个“失意的‘失败者’”，“四处碰壁的‘倒霉蛋’”，“不满现状的‘批评家’”，以及“受到排挤的‘横站者’”。

《聂绀弩传》共十二章。全书以时间为脉络，缀以聂绀弩不同时期的生活经历与创作，向读者展开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卷，折射出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像。第一章叙述的是清末聂绀弩的家庭背景及其幼年时的生活。第二至六章主要讲述聂绀弩在国民革命时期，外出求学及工作的经历。这一时期，聂在创作上初绽光芒，并初步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在第七至九章中，作者花大笔墨叙述了聂绀弩以笔为枪，在峥嵘岁月逐步成长为一名左翼文学阵营中的干将。第十至十二章则讲述聂绀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及政治理想。聂在文风与人格做出总体评价。具体来看，该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与浓郁的生活气息相糅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童年、少年的经历及家庭生活环境，给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打上了鲜明的烙印。作者不惜笔墨描绘了京山楚地的种种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在叙述中有意融入湖北地方方言，如把“革命”说成“格门”，把“造反”说成“讲反”等，有意突出方言土语在聂绀弩创作中的作用。作者擅长于铺叙中见曲折，朴实地显幽默，以生动平实的语言讲述聂绀弩的传奇故事，展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如第三章讲述聂绀弩初次留洋时经历的误会与“冒险”，采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使读者同舟共济，在未知中感受紧张与惊奇，较好地展示了聂绀弩的个性特征。

第二，全面的文学活动论述与丰富史料价值的统一。刘保昌对聂绀弩不同时期的创作的论述既兼顾全面又各有侧重。在论其早期创作时，以散文和现代诗歌为主，又间以《中国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沙基在哪儿？》等政论文章的分析，从中可见聂绀弩由无政府主义向“左倾”思想的转变；论其抗争年代的创作，以战斗性的杂文为主，但也穿插评述《萧红一亿》《毛泽东先生与鱼肝油丸》《忆康泽》等散文，饱含回忆式的温情。

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像

□倪贝贝

论其后期创作，则偏重对其旧体诗和古典文学专著的探讨，总结评判聂绀弩本质性的批判和建构在于“人的觉醒”。作者还援引大量史料与文学事件，使文本内容更显翔实丰赡。如列举鲁迅对聂绀弩在文学及思想活动上的引导，让人们感受他们“心理相契合的东西”。列举聂绀弩、冯雪峰、胡风等左联作家与林语堂、曹聚仁等在文学的大众化及女权等问题上的论战，又构成了百家争鸣、摇曳多姿的风景。

第三，缜密严整的结构与生动活泼的形式相结合。作者的布局谋篇颇费心思，以聂绀弩的创作兼生活轨迹为主线，以重大历史及文学事件为副线，双线并进，融事件陈述与理性剖析于一体，在历史及文学活动的大背景下评判其创作得失。该书共十二章，每章包含若干小节，作者对每个章节的标题都冠之以一个形象的概括，层次分明又生动活泼。章节小标题或简洁明了，或诗意盎然，或幽默风趣。如：“南国红豆”，“《野草》上的‘耳朵’”，“道不同，相为谋”等，恰到好处地点明相关章节所述主题。此外，该书还收录了百余张人物、书籍、历史事件的图片，图文相映成趣，传记的学理与传主的传奇故事相得益彰。

洞察